

单位代码	10476
学号	
分类号	D9

河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构建研究

专业学位领域：法律（法学）

专业学位类别：法律硕士

申请人：

指导教师：

2022 年 3 月

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OF THE ORGANIZ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Law

By

Supervisor:

March, 2022

摘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被确立为特别法人，但由于缺乏配套的成员权制度、组织结构制度、财产制度等，以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没有像公司法人那样有序且有效的参与到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落实和发展也受到了严重阻碍。鉴于此，本文以农村集体经济法人的特殊性为根本考量，运用规范实证研究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以及该制度的构建和实现进行研究，以期为这一制度的切实实施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思路。

本文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动态发展史、内涵界定以及目前国内关于该组织制度的立法现状着手。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动态发展演进的历史性概念，这是理解其核心要义及评定其法律属性的前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诞生于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其概念也必然具有中国特色。虽然我国不同的法律法规以及法学学者们对该组织的定义尚未统一，但通过梳理相关规定和研究可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在一定范围的农村社区内由成员共同工作，分享利益和成果，生产资料由社区全体成员共享。本文在对一些地区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实践现状分析后，总结出目前该制度的构建存在以下问题：缺乏制定统一组织法的现实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内涵不明、职能定位和法律性质存在争议、成员制度不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未建立独立的财产制度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特别法人制度还缺乏理论上的支撑因而难以在实践中落实，在民法典编纂的整个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问题也一直没有在学界达成共识。对此，本文提出的见解如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特殊性，如资产不可分性、地域性、收益分配均等性、稳定性等，而空有法人之“名”却无法人之“实”，也正是因为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这一制度的构建和实施变的复杂和困难。可以从其特殊性出发，借鉴成熟的企业法人模式，构建与其特征相适应的、具有可行性的治理结构，包括法人的设立、变更、消灭制度、组织制度、内部治理结构和财产制度。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特别法人，制度构建

ABSTRACT

Although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sation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s special legal persons, the lack of a supporting system of membership rights,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and property system has prevented them from competing in the market economy as effectively and orderly as corporate legal persons, and has severely hindere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sation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uses normative empirical research, histor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s to study the system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sa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realisation of this system,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ideas for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ystem and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sation, the definition of its connotations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domestic legislation on the system of this organisation. It is clear that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sations are a historical concept that has evolved dynamically,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understanding their core meaning and assessing their legal attributes. The concept of a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sation was born out of China's uniqu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its concept is necessarily Chinese in character. Although the definition of this organisation has not been unified by diffe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China and by jurisprudence scholars, a review of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research reveals that a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sation is a form of economic organisation in which members work together within a certain scope of rural communities, sharing the benefits and fruits, and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re shared by all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fter analys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sations in practice in some region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following problems exist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this system: large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unclear legal connotation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sations, controversial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legal nature, imperfect membership system, inadequat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failure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property system. The existence of these problems indicates that the special legal person system lack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is therefor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in practice.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codification of the Civil Code, the issue of the corporatiz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has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following

opinion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sations hav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divisibility of assets, territoriality, equ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stability, etc., and have the "name" of legal person but not the "reality" of legal person, and it is because of their own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This makes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ystem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It is possible to build a viable governance structure that is appropriat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gal person, including the system of establishment, change and elimination of the legal person, the organisational system,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property system, taking into account its specificity and drawing on the mature model of the enterprise legal person.

KEY WORD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corporatization, special corporation,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意义	1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1.3.1 国外研究现状.....	2
1.3.2 国内研究现状.....	2
1.4 创新点与不足	3
第一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概述.....	5
1.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沿革	5
1.1.1 互助组时期.....	5
1.1.2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5
1.1.3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5
1.1.4 人民公社.....	6
1.1.5 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6
1.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界定	6
1.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之法律规范梳理	7
1.3.1 宪法之规定.....	7
1.3.2 法律、法规之规定.....	7
1.3.3 地方立法之规定.....	8
第二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分析.....	11
2.1 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必要性	11
2.1.1 平衡我国改革与立法的要求.....	11
2.1.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要独立的市场主体资格.....	11
2.1.3 政经分离不彻底.....	12
2.1.4 完善法人治理机制的需要.....	12
2.1.5 保障成员权利实现的需要.....	13
2.2 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可行性	13
2.2.1 政策鼓励.....	14
2.2.2 实践探索.....	14
第三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构建的问题分析.....	15
3.1 欠缺制定统一组织法的现实基础	15
3.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内涵不明	15
3.3 职能定位和法律性质存在争议	16
3.4 成员制度不完善	17
3.5 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	18
3.6 未建立独立的财产制度	19
第四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路径选择.....	21
4.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其他法人的区别	21
4.1.1 企业法人.....	21

4.1.2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	21
4.1.3 村民委员会法人.....	22
4.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法人形式的设计	23
4.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路径——特别法人	23
第五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具体构建.....	27
5.1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法人治理结构的思考	27
5.2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法人治理结构的思考	27
5.3 借鉴企业法人模式，突出自身特殊性	28
5.4 建立法人的设立、变更、终止制度	29
5.4.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设立.....	29
5.4.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变更.....	30
5.4.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终止.....	31
5.5 建立法人的组织制度	32
5.5.1 确认成员认定标准.....	32
5.5.2 完善成员权体系.....	35
5.6 构建职能分明的内部治理结构	37
5.6.1 权力机构.....	37
5.6.2 执行机构.....	38
5.6.3 监督机构.....	38
5.7 厘定法人财产制度	39
结语.....	41
参考文献.....	43
致 谢.....	47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我国把农村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放在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在国家文件强调相关立法之前，多个省份如广东、湖北、江苏等都根据各省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关规定或条例，这对我国立法具有参考意义。《民法总则》第 99 条和第 101 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面解决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空缺问题，同时也引起了法学界就该特别法人的一系列讨论。从立法和法律来看，这不仅表明我国法律变革在随大趋势发展，另一方面也在通过赋予特别法人资格的方式摸索产权制度变革的途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已经实质上成为特别法人，法人制度的构建需要发挥该组织在社会维度上的功能，不能仅凭一条抽象的立法。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学界就此问题提出过多种方案，学者们始终难以达成共识，最高法还曾指出，如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问题无法完善，民法典就无法真正的适应我国现实国情。由此可见，虽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这个名词早在 2017 年就产生了，但至今依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新概念。因为即使召开过多场会议，进行过多次调研，最终《民法总则》乃至《民法典》都依然一以贯之的使用了原则性规定，在相关制度设计问题上留下诸多探索空间。现阶段，实践的需要迫切要求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进行构造，提高该制度的可操作性，以发挥其促进产权制度改革的作用。

1.2 研究意义

若问及本文研究课题之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分析。首先，本文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如前文所述，我国特别法人制度并无具体设计，故本课题不仅可以为该制度构建提供方向，对我国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更是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通过分析企业法人框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本质和治理结构，研究如何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塑造为真正的独立民事主体，厘清集体所有权内涵，完善我国所有权理论。其次，本文研究还具有实践意义：利于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城乡一体化推进过程中遇见的问题和挑战，如资产权属不明、成员身份难以界定等；利于实现政经分离，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的步伐；利于保障组织成员的财产权，让组织成员真正享受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有着不同的政体和历史，整体发展水平也不在一个层次。故而国外农业方面主要在合作社以及和合作制经济上有一些较为类似的研究，但是，国外虽有理论研究，却缺乏可与之相印证的实证案例研究，故在理论构想上，只有相近似的合作社理论可供参考，而无法提供实践探索经验。合作思想即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源起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合作化运动便是从那时的西方兴起。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都宣称人类罪孽的根源是私有制，并建议人类应努力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现在学界普遍认同这是近代合作制思想产生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合作理论的研究上有重大突破，他们将合作社看作是改造资本主义的一种制度形式。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总结教训，认为合作制极具改革意义，“集体所有制”的说法就是他提出的，他表示，私有制是相对于集体所有制而言的，私有制只存在于劳动资料私有的情况下。列宁也阐述了他的集体经济思想，同样与合作社有关，即要让所有居民加入合作社，并发展共产主义农业。^①

1.3.2 国内研究现状

《民法总则》施行后，学界主要围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的界定展开了讨论。据王利明教授介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是指利用集体所有土地或者其他财产从事农业经营活动的组织。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是常见的集体经济组织类型，也有通过改革成立的社区股份合作社等类型，他们无需借助其他组织的授权即可独立参与民事活动、对外作为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这些特征表明集体组织向法人的转化是可行的。^②魏振瀛教授认为，在我国，产生于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担负行政职能还要负责生产经营，是一个“政社合一”的组织。一方面，其可以行使某些行政职能，这是在得到授权后，以一种“行政机关编外组织”的姿态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其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类组织，自然要发挥组织生产经营的作用。^③

此外，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立法，不同学者之间的看法也有所不同。认为该立法具有正面意义的学者，如杨立新教授认为，该立法是我国法人制度的重大

^① 列宁. 列宁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9-731.

^② 柴瑞娟.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革之审视[J]. 甘肃社会科学，2021(04)：183-190.

^③ 孙迎春. 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治理结构法律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100—102.

进步,不仅使其可以作为集体财产所有者参与民事活动,也为今后在更深层次上改革农村经济制度创造了条件。^①再如教授李永军表示,这一制度的重要影响是,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集体经济组织确定了下来,他还建议将法人化后的集体经济组织依然享有集体财产权这一观点纳入民法物权编。^②不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学者表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依托的人民公社在市场经济中早已消失,当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早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故而将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归类为独立的法律实体是否有必要,是值得怀疑的。^③也有学者表示,可以是否盈利为标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归类而无需另设特别法人。

当前我国各地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尚在进行,由于实践案例不足和实践内容不完全,加之地域差距大、各地政策不同等问题突出,无法形成具有一般性和普遍适用性的规则,相关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化和总结。

1.4 创新点与不足

创新之处:本文以宏观制度的构建为研究角度,即将研究的焦点放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整体制度构建上,而非该制度的某一方面。试图在全面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演变历程以及制度现状的基础上,厘清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之内容,发现现有规定的缺失之处和漏洞。同时,鉴于实践中有一些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极为相似的主体,对此,本文在对相关主体加以区别、参考法人制度的一般规定的前提下,主张从相对成熟的企业法人制度框架出发,兼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殊性,构建能够反映其特点并符合实践需要的特别法人制度。此外,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不是在理论或者实践中二选一式的进行探讨,而是将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实现课题的多维研究。

不足之处:首先,本文着眼于宏观上的制度建设研究,但鉴于笔者学术能力的欠缺、理论知识的匮乏和调研能力的不足,本课题内容宽泛庞大,使得本文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架构上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研究不够深入透彻。其次,笔者对域外相关法律制度或学术研究掌握不够,以至于本文缺少对域外有益经验的借鉴。最后,本文制度构建的建议部分,仅是笔者的一些简单构想和建议。虽初衷是为了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改变其空有法人之名的现状,但一个制度的构建涉及多个方面的内容,本文对该制度具体内容的研究还不够充

^① 王洪平. 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和主体性关系[J]. 法学论坛, 2021, 36(05):18-28.

^② 刘孝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章程制度研究[D]. 山东政法学院, 2020.

^③ 许中缘, 崔雪炜. “三权分置”视域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J]. 当代法学, 2018, 32(01): 83-92.

分，尚需进一步论证。

第一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概述

1.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沿革

1.1.1 互助组时期

土地改革后，农民土地私有制产生。由于农户较多且单一农户只拥有少量分散的农地，土地和劳动力利用不合理、生产效率低下、人畜农具利用等矛盾和问题随之而来。为改变农业生产上的困境，东北、华北地区首先开始了又一次变革，地方上的农民自发设立了农民互助组。互助组是以农民私有为基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乡村集体机构，以自愿互利的原则进行劳力和生产资料的自由交换。互助组的产生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1.1.2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农业互助组虽然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终究是地区范围内农民自发的改良运动，共同劳动与分散经营的矛盾日益突出，制约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紧接着，在经济形势变化的推动下，农业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重点，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农业改造的主要内容。初级合作社是合作型经济组织，打破了个体农户小规模生产的限制、消除了互助组共同劳动，分散经营的矛盾。以私有土地入股和劳动相结合的方式参与农业生产分红激发了农民的办社热情，扩大了农业生产规模，增加了农业产量，促进了新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初级合作社是我国农业集体化的重大创新，是使土地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一种有效方式。初级社的特点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仍属农民个人私有，但初级合作社可以使用和支配。到这里为止，还尚未形成本文所讨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初级合作社形式下完成了土地所有权由“私”到“公”的过渡，这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生的有力条件。

1.1.3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 年中共中央要求整顿初级社，但是整顿效果不尽人意。1956 年中共中央强调要办大社，在政府的这一推动下，大量初级社被强行转化成高级社。至 1957，我国农业合作社已基本完成从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化。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个行政村范围内所有初级社及剩余未入社农户组成。社内要求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合作社成员自愿将私有土地免费转让给合作社，而农场牲畜和工具等自愿折价归合作社，转让

后的土地不再参与收益分红，全部社员集体劳动、产品统一分配，年终收益按劳分配；但社员可以保留少量小块园地及经营家庭副业。至此，农民私有制彻底被打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初具形态，也为后来政社合一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1.4 人民公社

合作社的创办使农业生产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1958年初，中央又提出发展水利，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合作社再次改良，所有小社合并成大社，“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创办大规模综合性集体组织的风潮，合并后的大社称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居住村民数量较少的乡，可以视情况将数乡合并组成一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可以说是一个行使着行政权力的基层集体经济组织，他可以直接指挥和安排社内的生产活动，但这样过多地干预生产的行为难以保障生产队的自主权，阻碍了农业的生产发展，降低了生产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人民公社最显著的特点。人民公社制度重构了传统乡村社会，使原本分散的乡村社会得到整合，它改变了我国农村的生产、生活模式，也改变了传统的所有制形式。

1.1.5 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兴起，“政社合一”体制结束，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得以建立，即土地所有权由组织统一行使，同时农户也享有自主承包经营权。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集体经济组织出现了农村土地合作社、专业合作社等形式。《民法总则》出台后，一些地区开始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法人化的道路，但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再由集体行使后，集体经济组织失去了管理权能，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些地区探索出股份制模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在我国国情以及多方力量的影响下，最终成了一个地位不明、功能不清的组织。

1.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界定

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事实的概括和对其共性的抽象构成的专制范畴，具有内在的同质性和外部的分离性。故而，准确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概念是研究本文的重要前置性工作。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学界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一些地方性法规虽然对此有一些规定，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作的定义也不相同，并且地方性规定不具有普适性。此外学者们因研究视角和深度的不同，对其所作的定义也不相同，但各学者都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地域性、集体所有、

经济性等特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成员，以其共同所有的集体财产为基础，由集体成员自愿组成，以共同劳动、共享收益为宗旨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这是得到学者们基本认同的通说。笔者认为，定义应当反映被定义者的本来面貌和独有特征。故笔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生活在同一片辖区内的村民，对他们所属地区的集体资产和资源进行管理和开发，以促进集体经济发展为目标的集体经济机构。

1.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之法律规范梳理

一部法律是将法律客体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以系统的、有条理的文字形式呈现出来，可以说是对一个法律客体最基础和客观的陈述。所以对任何事物的讨论和研究都应将法律作为尺度和界限来衡量，凡是超出法律已有规定的界限讨论的事物，都是无意义的，本文所探讨的制度之构建亦是如此。我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一定数量的零散规定，但未形成统一的规范体系。本节的目的是对我国法律体系中有关“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进行系统梳理，以便在此基础上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殊法律实体体系的构建。

1.3.1 宪法之规定

作为农业大国，三农工作始终是我国国家工作的重要一部分，故而有关农村经济制度的规定也是历来修宪的重点内容。现行《宪法》第8条不仅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机制，也将其他承载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的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区分开来，可以说是界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外部界限。第17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自主运作，表明其在宪法层面被视作私人主体。该条还规定了国家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基本原则，即民主管理原则。

除以上内容外，宪法没有更多详细的规定，也没有关于其内涵的界定。由于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因此不管详略与否，其他法律法规在对这一制度进行设计时都应将宪法的规定视作基本原则加以遵循。

1.3.2 法律、法规之规定

《民法通则》虽然已被取代，但其作为我国第一部通则性民事法律规范，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民事立法历史中的一座丰碑。《民法通则》涉及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主要有第27条和74条，从第74条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条中集体组织只是集体土地的

经营管理者之一；第二，立法没有明确其是否可以管理土地外的其他集体财产；第三，集体组织与村民集体二者关系模糊，难以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性质；第四，《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并同时使用了“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概念”来阐述，难以明确何为真正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业法》第 2 条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参与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组织统一列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见《农业法》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农业经济组织，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包含关系。修订后第 10 条将集体资产纳入了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权限范围，还规定集体经济组织不仅负有经济职能还负有社会职能，表明其是一个兼具营利性和社会性的经济组织。第 71 条和第 73 条是对“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经营体制的细化。虽然较之之前的规定有所细化，但《农业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含义及其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仍未有详细规定。

《物权法》第 60 条强调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既不存在相互领导，又不能取代对方，且均享有集体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另外，村委会的公共服务职能还应保障集体经济组织经济职能的发挥。第 63 条赋予了集体成员诉权，允许他们要求法院撤销该组织做出的不适当的决定，这与公司股东的诉权相似，也是集体经济组织类似公司法人社团性的体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规定》中也提出了成员会议、监督机构和成员小组等概念，虽未直接全面地明确组织内部治理结构该如何设置，但从相关概念上，不难看出该规定倾向于以类似公司法人的三级治理架构来安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

1.3.3 地方立法之规定

由于基本法律不够详细完善，但各地经济发展又需要可操作的相关制度，部分省市由此制定了符合当地发展所需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相比于基本立法，我国现有的大多数地方立法文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规定较为细致和完整，从最基本的法律内涵到组织的设立和组织运作再到成员资格认定都有所规范。虽然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往往是针对当地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对某一事项或制度加以规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地方性的尝试和实践可以作为国家立法的参考样本，为统一立法的制定提供基础和经验借鉴。

首先，在法律内涵上，各地方立法都用到了社区型经济组织来描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义，但并未详细解释什么是社区型经济组织。其次，关于主体资格的问题，

有些省市明确赋予其法人资格，如湖北、浙江，但是却没有进一步对其所赋予的法人资格的性质做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有些省市如广东省，虽然没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否获得法人资格作出规定，但这对其在该省从事经济活动并无任何影响，因为该省另外规定了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交易的途径。各地方性规定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立上与《民法总则》一致，在组织机构的问题上主要差别在于名称和职责划分，成员资格方面，地方性规定也将户籍作为确定成员资格的主要因素。相较于具有普适性的法律、行政法规，这些更全面的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立和运行，但尚不成熟甚至有些粗糙。

第二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分析

2.1 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必要性

法人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非自然人民事主体，特别法人亦是如此。谢怀拭教授认为“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探讨，其目的在于研究和论证其作为民事主体是享有权利行使能力的，也即论证该组织是具备法人资格的。一个组织是否是权利主体，具备法人资格与否，是一个关乎经济建设的重要问题”。^①从前文论述可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我国具有长久的历史，虽然当前其法律地位不明，但作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织，尽快构建完善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是很有必要且有意义的。

2.1.1 平衡我国改革与立法的要求

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要内涵之一，因此近年来，我国多个文件对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和相关立法都高度重视。有文件要求尽快起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的，对此我国农业农村部已在 2020 年拟定了试行章程；有文件要求研究发展家庭农场的法律问题；还有文件明确指出，为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应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正式确立其法人地位，且这一议题不止一次在不同的文件中被强调。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三权分置”土地改革是我国农村土地改革最受重视的内容。改革后三种权利分属于集体和农户个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原则，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制度的根本，必须予以体现和保障。但是在“三权分置”改革过程中，中央文件没有就如何充分发挥集体统一组织协调、统一生产服务的功能做出安排，也没有对如何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做出部署。笔者认为，尽快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地位是首要任务，但事实上，对此只有地方立法中，其市场主体地位才以注册证书的形式授予。然而，赋予民事主体资格的立法权限仅限于制定法律，故地方性规定并不能弥补中央立法的缺陷。

2.1.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要独立的市场主体资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我国已有多年发展历史，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赋予其法人地位，既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为后续相关部门的立法奠

^① 宋天骐.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内部治理中的“人”与“财”——以治理机构的人员构成与集体资产股权为观察对象[J]. 河北法学, 2022, 40(04): 34-50.

定了基调。《民法总则》之前,未曾有任何法律明确其民事主体地位,导致市场主体地位缺失,使其无法以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义独立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直接影响了其经济职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就是前文提到的村委会代行职能问题时常使集体利益受到损害。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土地所有者,同时在与个人建立农地承包关系时,作为发包方,其必然负责农地的经营与服务事项,但实际上,一些地区因组织内部机构的不完善而缺乏存在感,难以发挥组织统筹协调的作用。近年来,法人地位的缺失,使其缺乏开展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资格,也阻碍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的发展。^①另外,由于上层建筑的不完善,法院在审判活动中也时常面临矛盾困境。法人资格的赋予不仅可以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理顺其内部组织管理关系,还可以帮助集体组织充分实现集体资产的效益,使其成为适应市场对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组织体。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是保障其在市场经营活动和司法中具有独立法人主体地位的必然选择。

2.1.3 政经分离不彻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还发挥着一种社会功能,即为农民的生活和养老提供基本保障,从而稳定了农村地区的秩序,抵御了政府的干预和对私营部门发展的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的长足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仅靠分散农户的力量难以实现,如何将分散农户有效组织起来是关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分层经营的优点显现出来,但是盲目夸大了个体农民的劳动作用,以至于村内原有的生产组织日益涣散,影响了农民集体能力的发挥,导致在遇到公权力的无端干预时,农民集体对此种情况束手无策,从而造成了农民权益时常遭受侵害的现状。村委会同时扮演着“公”与“私”的双重角色,难以完全站在私权利一方对抗公权力无端的干预,同时《村民委员会法》对村委会的规制较为粗糙,没有科学的管理制度,极易发生村官腐败事件。与此相反的是,在我国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极少发生侵害成员权的事情,这些集体经济组织都表现出较好的组织性和团体性。因此构建并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有利于保护农民集体和农民私权不受公权力滥用的侵害。

2.1.4 完善法人治理机制的需要

本文所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构造,即从基本概念、法人的设立到终止、

^① 管洪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制立法建构的基本思路[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0(01): 51—60,

成员产生及成员权的保障、法人内部治理结构等问题来构建。本文看法是：遵循一般规则，突出个体特征。即遵循法人治理模式的一般规则，将特别法人的制度框架架构起来，同时照顾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特点，在制度细则的填充中融入其独特性。如此来制定章程，成立三权分立的权利机关、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并明确各机关职责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最佳选择。关于这一制度的具体架构，笔者将在第四章详细论述，故此处不再展开。虽然不是所有法人都必须选择三权分立的治理结构，但是合理健全的治理结构和机制可以为法人的资产运作提供保障。即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不是典型的营利法人，建立健全合理的治理结构也是保障集体资产高效运作，杜绝个别村委会成员权力滥用、避免集体利益遭受损害的组织基础。

2.1.5 保障成员权利实现的需要

法律主体地位虚设，部门关系混乱，人员交叉职责不清，无序的经营管理，必然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对于一个民事主体来说，清晰的内涵和外延界定是其权利义务在法律上得以明确的基础，尤其在特定主体的权利义务确定上，这一问题的确定显得格外重要。比如在某些对意思能力有要求的民事活动上，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行使应加以限制、无劳动能力者因行为能力上的客观差异，对其义务的承担应有所减轻等。同样的，对于成员来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构建将对成员资格的确定加以明晰，构建职能分明、运行有序的经营管理体制，使集体权利和义务能够分配到每个集体成员，从而确保每个成员的集体权益得到有效实现。

2.2 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可行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对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对此，国家不仅在政策上多有引导和支持，法律层面上也在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是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市场，完善特别法人治理体制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正在起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目的在于完善对特别法人治理机构的规制，但是该法的起草仅仅针对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这两种形式本质上与人民公社和高级社没有太大区别，甚至可以说是其二者在新时代下的翻版，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封闭性和内部依赖性较高，这显然不符合当下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入市场发展的理念。因此，有些地区已经开始尝试其他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在政策支持和试点经验的双重支撑

下，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可行性。

2.2.1 政策鼓励

从我国多年建设农村法制，发展农村经济的情况来看，政策鼓励始终走在前列，是各种制度改革的有利条件和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是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自然也得到了这种有利条件。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完善治理机制”，强调以“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地位”为原则；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列为第三类立法项目；2021年6月起草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审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初稿）》。由此可见，我国政策和立法对此相当重视，虽然相关政策尚未完全落地，但现有政策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构建具有引领和鼓励作用。

2.2.2 实践探索

前面提到《组织法》对法人形式的规定太过局限和保守，已有地区尝试其他法人形式，较多的是村投公司。如江西省允许有条件的集体组织可以成立村投公司来经营管理集体资产以增加集体收入，这种实际上与《组织法》中的形式没有差别。根据当前尝试村投公司的地区，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模式：第一种是集体独资模式，即由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委会独资，其中居委会独资根据原本有无集体经济组织而分为两种情况，若没有，村投公司成立后直接就替代了集体经济组织，若有，当村投公司可以独立实现特别法人的功能时，原本的集体经济组织才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具有代表性的试点是石门村和光明村。第二种是成员与集体合资模式。具有代表性的是萨帕克村，这种将成员引入投资的方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能够激发内部活力，促进公司的发展。第三种是村村合营模式。典型的是湍口泉乡，该乡成立了一个由十三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合资的公司，这种公司极易形成整个镇的村投公司。第四种是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引入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资金或资源，这种模式打破了集体经济组织完全公有制的常态，这并非坏事，反而能够加快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融入市场经济的脚步。笔者认为，这种模式下当然应该借鉴公司法人的形式，因为只有公司法人才做到了彻底的政经分离，才具有开放性市场主体的特点，这种模式的法人治理结构也是笔者将要讨论的重点。

第三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构建的问题分析

3.1 欠缺制定统一组织法的现实基础

由于经济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参差不齐，并且差距较大。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体经济组织，多次改革试验后已经具备成为特别法人的条件，而相对落后的地区，甚至没有规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法典》并没有对特别法人制度加以具化，虽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起草正在进行，但是其中一些制度设计，尤其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类上，存在不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问题。考察并对地区间发展情况的差异之处进行分析，这对构建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制度有极大帮助，对灵活构建具有地区适应性的特别法人制度和制定具有可行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具有实践考察价值。

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需要，发达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反映地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人格发展程度的较为成熟的法律人格模式。目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模式主要有三种，其中，合作社法人模式下法人由基层政府颁发法人证明文件，法人可凭证明文件领取机构代码、开设金融账户、建立会计制度，完善的制度设计就如同为合作社法人量身打造的各种证件，使其能够在经济市场中顺利地开展经营活动。浙江省的村经济合作社就是借鉴了该模式进行改革的产物。公司法人模式是目前较为成熟的法人模式，对构建农村集体经济法人制度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采用此种模式较为典型的地区有江苏华西村、上海镇红椿村、马桥镇金星村、北京丰台等。股份合作制法人模式的优点是将资本与劳动完美结合，激发组织成员劳动积极性的同时又能很好的盘活集体资产。

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仍然较大，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相比于发达地区就缺乏适当的改革，没有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创造条件。前文中提到的村委会代行经济组织职能的问题大多发生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这使得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虽然存在但是无法发挥实际作用，更不用说一些尚未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其发展更是纸上谈兵。故当下最要紧的事项是借鉴发达地区的发展和改革经验，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等积累了足够的基础时，可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制度，促进全国农村地区的平衡发展。

3.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内涵不明

上一章通过阐述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可知尽管从中央到地方,我国不仅有多部法律、行政法规,还有多个地区出台的地方性法规规章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出了一定的规定。但是具有普适性的中央层面规范较少,多数是非系统的、内容单一的规定,且已有规范大多只是原则性规定,其中最基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和法律内涵等不仅粗糙且不同法律之间有冲突之处。法律概念是总结事物和具化对事物法律认识的桥梁,正是有了法律概念,一些事物才能在法律上得到表达,任何法律缺乏概念的支撑都是无生命的。所以,我们研究某项制度的构建时,首要的任务就是由小及大、由表及里,分析该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的法律含义,最终目的在于厘清该制度法律内涵。那么,回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构建研究上,厘清其法律内涵,是研究其法人化路径选择的前提,也是构建特别法人内外治理结构的基础。对此问题,不同学者对其定义和认识各不相同,另外还应注意,学者们在学理上下的定义在未被立法采纳之前都不能成为法律概念。我国一些省市制定的地方性规定虽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义,但是地方性规定终究具有非统一性、粗糙性和单一地区适用性的缺点,无法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法律定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模糊的法律内涵使得其究竟是何样的组织以及究竟能否以法人身份参与市场竞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极具争议,这也给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作带来极大困境。

3.3 职能定位和法律性质存在争议

相比公共职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历来都是更多地肩负着行政职能。在高级合作社时期,集体经济组织只是国家为了完成一定发展阶段的改革任务,而使用的一种政治手段而已,其并非市场发展一定阶段催生的新型市场主体;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更加被忽略,这意味着其无法成为真正独立的存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是“政社分设”,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使命也只是为了便于实现国家大力发展重工业的目标。由此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伴随着职能定位不清的问题。目前,有的集体组织还与村委会的社管职能存在重合。^①实践中村委会代行职能的情况很是常见,以致于集体成员难以区分二者的职能和定位,甚至会将村委会主任视作集体组织的顶层管理人,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空有虚名。作为独立民事主体就必须与行政组织有明晰的界限,在职能上也应当与村委会相区分,只有在对其二者有清晰的认知的前提下,才能使相应的制度设计合理化,从而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① 于雅聰,王崇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历程、检视与未来展望[J].农村经济,2020(03):10-18.

人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特别法人制度是一项新的制度，要为一项新的制度构造一套完善的规则是一个挑战，但并非无路可循，特别法人也是法人的一种，因此最科学也最不易出错的方法就是参照较为成熟的企业法人规则，若想参照其他法人规则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规则，则必须先确定其法律属性。前文已经提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经济和公共双重职能，正是其双重功能的属性使得该法人制度的构建如此棘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可以以及如何才能进行民法改造，其究竟为私法人还是公法人，以及法人性质是怎样的，这一系列问题还很模糊。因而其法律属性在立法中必须予以明确，然而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立法对此始终态度模糊，以至于在《民法典》颁布后，该组织的法律地位仍极具争议。笔者在此先不详述其法律性质与一般法人有何不同，此内容将在后面讨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路径选择部分加以阐述，以此作为笔者本文观点的理论支撑之一。

3.4 成员制度不完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制度主要有两方面问题：一是缺乏一个的认定成员身份的准绳。成员资格是集体成员获得成员身份、行使成员权、参与集体事务、享受集体财产收益的前提。这里研究成员身份讨论的并非身份问题，实质上讨论的是财产问题。成员身份的认定有助于确定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关于集体成员资格的所有争议几乎都是围绕集体财产利益的分配。^①虽然当前我国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有关于成员资格规定的村规民约，但在国家立法层面仍有缺失，部分地方立法对此有所涉及，但因各地区实际情况的差别，不同地区之间的立法所确定的规则仅能在当地范围内适用，因此我国关于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尚未建立起具有全国统一性和灵活适应性的规则。二是集体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设计不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是特别法人，组织成员同样具有区别于公司股东的特殊性，那么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又与该组织成员有何不同？显然这一特殊的权利义务体系尚未制定系统的规定。

《物权法》中关于成员权的规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却被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学者们忽略了，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物权法》的立法观念由重视规定“权利归属”到强调“物权利用”的转变，使得集体所有权理论的缺陷在物权立法中未能得到完善。其中集体所有权主体制度与集体组织成员权制度息息

^① 管洪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类型定位之证成与价值展开[J]. 法学论坛, 2021, 36(05): 29-39.

相关，集体所有权主体制度不仅可以通过集体组织成员权体系的构建而丰富，而且可以确保集体成员基本权利和利益的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缺乏基本认同，例如组织成员不能参与土地征收过程，难以获得征收带来的利益，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农民权利的弱化使得集体成员常常脱离于集体经济，也难以参与到组织的运行中去，由此可见，确定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是保护成员权利的根本所在。当前学界对成员资格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也多样化，可见急需立法确实统一认定标准，解决成员资格难以认定、司法裁判标准不一的问题，以切实保障集体成员权利的实现。如何保障集体成员的表决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重要权利，如何实现村委会与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独立，如何避免少数人控制，是迫切建立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原因。

3.5 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公司法人都是由一定数量的组织成员组成，应当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以保障组织的正常运行。由公司法人可知，现当代经济组织通常具备三种组织机构且各机构承担不同的分工，各自责任明确，既有配合又有制约，分别是权力机构负责决策、执行机构负责运作以及监督机构负责制约。但是这一问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内涵问题一样，不仅对此没有权威性的中央法律或行政法规有所规定；而且虽然我国已有 5 部地方性法规规章专门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规则，但其中关于组织机构的规定仍待进一步完善。^①从该组织的历史来看，长期居住在某一地区的人，若该地区有了集体经组织，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就自动成为该组织的成员，无需满足额外条件或办理相关手续，并且他们往往是集体组织权力的行使者，管理者组织的大小事务。然而事实上很多地方的集体经济组织都没有正式的权力机构，以致组织成员缺少意愿表达的平台和保障合法权益途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完善的内部治理机构是村委会成为功能性替代组织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权力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缺位，给一些村委会成员创造了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机会。

组织是合理组织和协调人们实现特定目标，具有相对可识别界限的社会单位。^②因此，一个组织应该具备“决策、执行、监督”等完善的组织机构，各机构分工明确且具备专业化的运作能力，而专业化运作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有助于

^① 《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办法》，《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扬州市经济合作社组织暂行办法》，《泰州市村经济合作社暂行管理办法》

^② 高海. 农用地“三权分置”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该组织的有序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动态发展状态。

《民法总则》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层面上拥有了法人地位，但其并不能像传统法人一样正常的参与市场经济，因为还缺少具体组织机构的规定。然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组织制度的完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集体成员数量较大，普通的民主管理模式会带来较大的管理运作压力，再如不完善的监督机制使一些管理层人员有机可乘，给了他们以权谋私的机会。实践中，已经进行了改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多或少的借鉴了公司法人的组织结构，这说明公司法人的组织形式是有一定优势的。公司内部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权制衡，既有利于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又符合投资者和公司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多数学者认为公司法人的制度设计，对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各项制度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笔者对此观点持肯定态度，认为在参考公司法人制度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二者的差别，在制度构建和组织机构设置上必须考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殊性。

3.6 未建立独立的财产制度

独立的财产对法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其以民事主体身份进入市场的物质基础，也是其设立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作为特别法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然也不例外。关于财产问题的讨论，无外乎两个方面：第一，财产的内容和范围；第二，财产的权利归属。

关于农村集体财产的内容学界没有争议，即资源性资产，如土地、森林，该类资产的核心内容是资产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生产经营类资产，如房屋、农具；非经营性资产也被称作公益性资产，主要指因教育、卫生等形成的财产。在本文相关制度讨论中，主要关注的是资源性资产。

关于集体资产的所有者，此问题尚有争议。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2011 年国土资源部 60 号文件、马俊驹教授表示集体财产的所有者是集体组织；^①《物权法》、《土地管理法》、于飞、韩松等则认为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人是全体组织成员，但集体经济组织同样有权对集体财产进行管理。若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视为集体资产所有者，那么法人化后的集体经济组织自然也可以将该资产作为自己的独立财产。若将农民集体视作集体财产的所有者，那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使完成了法人化转变，也没有可以作为物质基础的独立财产，这将会造成法人在实际运行中产权混乱等问题。首先，农民集

^① 吴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制建构[J]. 河南社会科学, 2021, 29(02): 28-36.

体不属于我国法律上所称的民事主体，由其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与我国立法语境不符。其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意味着其要作为法人从事民事活动，必须对其参与的民事活动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往往体现在财产责任上，可见独立的财产是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重要前提，没有独立财产法人则不能成立，更无从谈起民事责任的承担了。若认为集体组织是集体财产所有者，那么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出现债务无法清偿的情况，就可能造成集体土地的流失，因为法人要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集体土地也是集体财产的一部分。集体土地是农民世代赖以生存的保障，若失去了土地，无疑是瓦解了农村社会的根基，进而会造成农村社会的动荡。所以，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必须建立独立的财产制度。

第四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路径选择

4.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其他法人的区别

特别法人也是法人的一种，因此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时将其与其他同类型主体做一个全面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明确特别法人的外延以及确定特别法人制度的构建方向。本节将对此展开论述。

4.1.1 企业法人

企业法人在法律上的定位是有利可图的法人，即从事盈利业务的独立法人，有别于营利财团。企业法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区别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首先，二者设立目的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不是为了追求纯粹的利己目的而设立的，虽然同样会将经营所得在组织内部分配给成员，但管理方式和利润分配的方式，却不同于企业法人。普通企业注重利润，其利润的使用和分配遵循固定的顺序和方式。除了经济功能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发挥社会和公共功能。其收益首要任务是投资于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之后，若有盈余，则根据劳动付出比例分配给集体组织的成员。其次，两者的职能定位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经济职能与公共职能于一体的组织。在这方面，企业法人不具有公共管理职能，也不具有某些社会职能，只具有自己的经营管理责任。最后，二者对成员数量要求不同。企业对成员有一定的数量要求，如为了保护公司的人格基础，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规定了一个上限。相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数量并不影响该组织的人合性，因为其成员之间与公司股东间的关系不同，因此其对成员数量没有限制，这就决定了二者在组织构成上也有差别。

4.1.2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

宪法第8条第1款所指的“在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其中就包括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类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他们也都是一定范围内的农民联合组织，其成立目的同样是为了克服分散农户在农业生产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学者将这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归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范畴。^①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忽视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质，尽管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类似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二者都是不同

^① 周晓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10，116-117.

于以资本为纽带的企业组织，且二者的内部成员都是资本和劳动的集合体，但这并不能成为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归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充分理由。

首先，二者的成员资格确定标准不同。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而言，除了与集体土地权利有关的因素，如宅基地使用权等因素需要考量外，户籍是最基本的决定因素，户籍归属性是其成员资格最特殊之处。相反成员户籍并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成员资格确定的考察条件，参与或退出合作组织较为自由，非本地户籍者不仅可以入社，而且与本地户籍的成员权利义务是同等的。其次，二者的成立基础不同。从第一章中可以了解，集体所有土地与生产资料始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是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催生的产物，可以由几个不同区域进行合作，也可以根据产品和生产目的的不同建立不同类别的专业合作社，由加入的社员进行投资建设，如养殖专业合作社和蔬菜种植合作社。最后，二者的收益分配方式不同。本文多次提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具备双重职能，且以社会公共职能为重，因此其收益在分配给成员之外，还要将建设集体公益事业所需的费用放在收益分配的首位考虑。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是成员为了提高收益组建的，其首要目的当然是借助科学统一的经营管理结构，摆脱个体经营的缺点，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增加社员收入。

4.1.3 村民委员会法人

我国法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总是被放在一起讨论，实践中，二者在性质、职能上也常常有混淆和冲突的情况。村委会尤其会在集体资产的处置权上与集体组织产生碰撞，但是一旦出现涉及管理集体资产的事项或保护农民利益的问题，其通常以集体经济组织虚置为借口，推卸责任。另外，在集体资产管理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矛盾，村委会往往被列为被告，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处理也存在颇多争议。^①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职能，以便更好地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改革和建设农村经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作用。

对比之下，村委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是有较明显的区别。首先，在性质上，前者是基层村民自治组织；而后者是一个经济组织。其次，从职能上看，前者的主要职责是对村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务的安排及管理；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原则上只负责经营村集体财产，而不负责管理组织的公益事务。因此二者在从事村集体事务上有不

^① 李国强，朱晓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理机制研究[J]，财经法学，2022(01)：62—75。

同的职责分配。最后，从组织的范围上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有多种范围级别，如村民小组、村或乡，但村委会都是以村为级别的。

4.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法人形式的设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是目前正在起草的一部专门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制定的法律。此外，依据该法还出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以下简称《章程》），无论是《组织法》还是《章程》，通过其内容可知，其二者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都完全地限制在两种，即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这与第一章中论述的人民公社形式实际上并无大异，但是由第一章历史变迁的论述可以看出，这种组织形式具有内部依赖性和封闭性的缺陷，因此更适合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因为这些地区的集体组织内部更具有劳动合作基础，落后的经济使得外资难以进入，集体经济就更加难以发展。

《组织法》和《章程》整体上都是在合作制的基础上，以建立股份合作制为主要方向，笔者认为，这种思路实际上体现出了一种探索的保守性，在争议颇多且首次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出专门立法的情况下，保守的做法确实安全，但对组织形式过于刻板的限制却实为不妥。当然，这两种形式并非没有价值，正如前文提到，对于相对封闭的、有劳动合作基础的地区，这两种形式更加注重民主，政经分离也表现的更明显，并且经营风险小，更有利于成员权利的保护。但是，其二者毕竟是在旧形式上的现代化改造，且在当下农村劳动力外流严重，资源主导形势突出的市场现实下，这两种组织形式的缺点必然会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使其丧失市场机遇。

从前文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可知，《民法典》对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村也作了规定，即允许村委会代行职能，这表明《民法典》实际上承认了当前农村发展的差异化。如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起草也应承认并考虑由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除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以外的其他组织形式。两种合作制形式虽明确了集体组织的职能，但是各方面都限制在组织内部，且政经分离不彻底，企业法人具有完全独立性，政经分离较完全，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法人形式，但是其制度是针对一般法人制定，尚不能完全与特别法人的需求相契合，故其整体制度尤其是治理结构还需调整和完善。

4.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路径——特别法人

《民法总则》在“特别法人”的规定中新增了一个概念，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

别法人，对此我们应当从多角度出发进行解读。虽然立法上其是特别法人，但依据立法者初衷和对不同农村地区发展和实践的考察，其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法人。首先，从立法者原意来看，立法者认为，增加一个特殊类别的法人是因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都难以准确描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正是特别法人概念产生的意义所在。但是在构建法人治理体系和探索集体改革的模式时要注意区分特别法人的不同形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全都按单一的法人模式治理。其次，从实践来看，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然徒负虚名，根源在于村委会代行职能，以致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连自身的经济职能都无法独立发挥，又如何用法人模式运行呢？因此，对特别法人的内涵进行综合解读，能为构建特别法人制度提供具体全面的基础，也是新时代对完善法律制度提出的新要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加入特别法人，其区别于传统法人的特别性主要表现在：第一，资产具有不可分性。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基础，法人只是代为行使集体资产所有权的主体，集体资产属于全部成员，不能分割，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产具有不可分性；第二，地域性和稳定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出现和发展一直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纽带，形成一个组织，其成员之间相互熟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区，同时自然排斥外来者；第三，成员具有社区性。成员身份源于成员本身属于该社区的一份子，其加入和退出都与其身份属性相关；第四，职能特定性。从相关规定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化为特别法人后的职能也是经营管理集体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等经济职能；第五，收益分配均等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是按照成员身份平均分配收益，而不像企业法人根据股东持有的份额进行分配。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选择特别法人的法人化路径是具有历史背景、立法背景和理论前提的。从本文第一章可以了解到不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何种形式存在，其本质都是农民集体为了追求利益与发展采取的合作方式，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自的形态和特征且都存在制度缺陷。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模式的变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各地产权改革的推进，总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于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前文也梳理了我国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规范，这些规范是分散且不完备的，主要表现在立法层次低和区域不平衡上。并且从相关法律中可知，集体性资产是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存在的根本，关系农民生计和利益，又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这些特点是其成为特别法人的先决条件。在学理上，关于其特别法人地位的争论可以追溯到法人分类的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应借鉴德国经验，将法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但《民法总则》最终采用了以营利与否为标准的分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类特别法人，这种分类实际上是有不合理之处的，因为并不是所有法人都可以根据营利与否区别开来。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一是商法学者的建议，二是这种分类有助于司法实践提高司法效率。此外，在《民法总则》之前，我国法律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一些繁枝细节的规定，但却没有任何规定表明其在法律上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弥补的法律漏洞，《民法总则》的修订适逢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迫切需要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于是在此背景下，便将其增设为特别法人。

综上所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自己独特的特殊性，其不能被简单按照营利与否进行归类，而其被设立为特别法人不仅有历史、立法和理论上的基础支撑，也是在其法人化过程中不丢失其特殊性的最佳选择。

第五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具体构建

笔者在前文论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基础理论、现状和困境以及路径选择，梳理出了现存模式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治理结构的一些问题，指出了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方向，即借鉴企业法人的整体框架，同时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殊性，设计出符合发展实际的治理结构。但起草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并没有将企业制的特别法人形式纳入立法设计，这是不符合集体经济发展实际的，据此已出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若想适用于企业制特别法人还需有所调整。

5.1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法人治理结构的思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以下简称《章程》）将企业制的特别法人形式排除在外，这个在上一章已经提到。起草者对此的考虑基于已有公司法可以套用，但是这种思考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营利性法人，其为集体服务的本质更为突出。这就需要《章程》在治理结构的设计上对法人的权利义务加以改造和规制，否则会造成法人化后的集体组织仅注重营利而忽视成员权益的保障。此外《章程》虽设计了两种合作制法人形式但却没有设计两种治理结构，而章程现有的民主管理模式更适合封闭性较高的合作制经济组织，这使得该章程缺乏适用的灵活性。

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是劳动与资本的组合，与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类似，资本多数决的表决原则似乎更合适，但是《章程》中民主性突出，不以资本论权利，强调人人平等，虽然公平但阻碍资本注入与组织发展。从《章程》第 39 条可知，股份合作制设置了多种不同类型的股份，根据股份类型的不同其份额也不等，如此一来就会引发表决原则的争议。对于个人持有股份超出平均值的成员，必然更希望以资本表决，相反的成员则更希望以人数表决。《章程》未将两种合作制集体经济组织在治理结构的构建和选择上加以区别，此部分的修改是必须的，但是在修改时绝不可忽视特别法人的特殊性。关于权利机关的设置笔者的观点将在后文详述。

5.2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法人治理结构的思考

现当下，一些地区在尝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规定的

合作制以外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其中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已有《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范，但这类企业实际中还存在治理结构上的问题，如权力机关和监督机关的设置和成员组成仍局限于集体组织成员内部，并且没有董事会，这种内部成员控制的治理结构必然缺乏吸引外资入股的能力。那么如果设置了像公司一样的“三会”，这类形式的经济组织是否没有了存在的意义，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与公司最大的区别在于，无论内部成员还是外部主体，只要投资入股，所形成的财产就不再属于个人，并且持股者不能主张索回，也不能解散企业，相比于公司，这种形式更利于集体成员权利的保护，但是外部投资者的权益同样需要保护。由于集体企业已有条例规制，《组织法》便无需对此详尽，只需将“三会”的详细规定授权给国务院即可。笔者在此不过多讨论。另一种形式是村投公司，这种形式的特点就是开放性较高，对外部资本吸引力大，也更容易破坏村投公司公共服务的功能。这就需要对村投公司“三会”的设置做详细规定，这部分笔者将在后文加以论述。

笔者认为，起草中的《组织法》应当将公司制的特别法人形式纳入规范，可以通过将修订相关条例的权利授权给国务院，以完善特别法人治理结构。在修订相关条例时，要明确只有将集体资产作为企业经营管理基础的集体企业才是我们所讨论的集体经济组织。因集体资产属于全部成员共有，在股权未能成功回购时只能对外转让，出现外部资本控制的概率几乎没有。因此笔者主张公司制的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借鉴企业法人模式，关注自身特点，通过建立“三会”达到三权平衡，从而保障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和增强吸引外资的能力。

5.3 借鉴企业法人模式，突出自身特殊性

企业法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一种常见的模式化组织结构，其治理结构的优越性必然是无可比拟的。第一，有效整合内部各要素以达到法人的有效运转，平衡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如通过建立员工激励制度、制约高管、监督执行管理层等，化解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运作状态，同时有效的监督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错误决定而造成的损失。第二，合理完善的治理结构，使各阶层员工的角色更加明确，利于员工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从而使企业在现代经济市场中也能高效运作。第三，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不仅拥有一套简单而科学的管理模

式，还独立于政府，有助于集体财产的保护和价值化，释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借鉴企业法人模式，不仅是因为企业法人模式存在优越性，还因为其与公司存在相同之处，本身就具备公司化改造的条件。如二者都制定了财产管理制度、利益分配制度和财会制度能够保障组织的有效运行；二者在法律上都是具备独立地位的市场主体，可以独立担责；二者都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有一定的担责能力。此外，多年的公司化改革探索也为治理结构的全面改造创造了基本条件。^②

有观点指出，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治理结构应遵循一般法人的规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特别法人虽然是法人的一种，但既然加了“特别”的前缀，那就说明特别法人与一般法人是存在差别的，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否则特别法人的分类有何意义呢。除了上一节中说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成员、资产、职能上的特别之处，还有学者表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普通法人、公益性组织有较大差别，故而明确其特殊法人地位是制度构建必须考虑的事情。”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在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时，要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的特点融入制度构建之中。笔者将在下文详细论述这一制度构建的具体路径。

5.4 建立法人的设立、变更、终止制度

5.4.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设立

法人的设立有三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法人设立的原则、设立的条件和设立的程序。法人的设立原则中，核准主义要求下，没有特定机关的特别许可程序，只是需要由法律正式授权的专门机关或部门对设立法人的申请即其提交的审核材料做一个实质性审查。^③核准主义是一种平衡了私法自治与公共秩序的设立原则，因此也是现代法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对于不同类型法人的设立究竟该采用何种原则，法人是否有涉公共利益是主要决定因素。

为了促进交易，营利法人通常只要求适用准则主义，即没有特别许可的程序，也不需要主管机关对其进行实质性审查，只要符合法定注册条件，就可以向注册机构申请法人注册。而对非营利性法人，由于其从事的活动的特殊性，考虑到公共利益，其常常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因而其设立采用核准主义。本文认为，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

^① 宋天骐.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设立的特别性[J]. 求索, 2020(05): 154—162.

^② 孙宏臣. 民法总则精解[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92.

^③ 法人的设立原则: 自由主义特许主义、核准主义、准则主义、强制设立主义。

织法人的设立，核准主义原则更为合适，也更符合其特性：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以非营利性活动为主的组织，采用核准主义原则可以对其设立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能够更好地维护其公益性；其次，虽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质上是私人法律实体，但它们也具有公共法律实体的特征。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肩负着乡村振兴的重要使命，其发展如何，不仅事关私利益，更事关公利益，因此政府的扶持和监管是必不可少的。最后，成员的社区性决定了成员加入和退出法人组织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且中国农民的总体素质相对较低，特别是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缺乏现代社团运作所依赖的权利和民主意识，为了杜绝被少数有权有势的人控制，政府更应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实施严格的监管。

地方法规对设立条件已有涉及，比如湖北省要求集体土地所有权必须掌握在集体经济组织手中，并且还要有相应的机构设置；广东省的相关条例不仅强调了法人组织机构的设立，还对组织的章程制定作出了要求。笔者认为，既然是法人，那除了要具备《民法总则》第 58 条第 2 款的统一规定，还要有一定数量的成员和合理合法的章程。只不过作为特别法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在这些规定的具体内容上要考虑自身特殊性而不同于传统法人。

在设立程序上，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程序：由一定区域内的全体农民共同发起设立，经主管机关审核同意后，召开发起人会议，推选组织机构的管理层和执行层人员，相关负责人要负责制定法人章程、编制成员名册、清查集体资产，发起人会议要对法人章程、成员名册等进行表决，会议各程序必须受主管机关的监督。一系列事项完成后，报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并取得法人证书。笔者之所以认为在上述发起程序中加入主管部门的监管，是因为该法人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公共利益，如此一来，其设立过程必然少不了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出现集体组织被少数人控制的情况。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毕竟在本质上属于私法人，政府在鼓励引导的同时还要保障农民集体意志绝对的自由，不能重蹈集体化运动时的覆辙。故鉴于此，笔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设立采用此程序较为适宜。

5.4.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变更

对私法人而言，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都可以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自主决定法人的变更。而集体组织法人不属于完全的私法人，涉及法人内容变更的，如改变住所、名称、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是否需要批准并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但广东省和湖北

省的相关条例要求必须提交变更请求，且获批准后才能进行变更，这种规制有一定的道理。依然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对其变更登记事项进行加以限制是有必要的。如法人名称的变更，名称不仅可以防止主体混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名称往往与社区名称有联系，体现着社区认同感；并且集体组织多以行政区划作为名称前缀，由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名称更不可以随意变更。法人的合并通常无需批准，只需内部表决通过即可，但是笔者前文已经提到，社区性和历史性是其最大的特点，因而不同区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之间会缺乏认同感，所以笔者主张该法人非必要不合并、不分立。万不得已时也必须首先经内部成员和权力机构严格表决，并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执行。

5.4.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终止

公司法中法人终止有三种原因：第一，解散。常规解散也有三种：存续期满解散、发生应当解散的事由、权力机关决议解散，前两种情况下法人若要存续可以通过修改章程的决议来实现。另外法人也会因为合并或分立而解散，但这种情况下法人并不一定彻底终止。法人合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吸收合并，顾名思义就是两者只留一个，被吸收者解散；另一种是新设合并，是“二合一”，即原本的两个都不复存在，组成了一个新的法人。而法人分立，只有新设分立，即原法人解散。第二，破产，企业法人经常因市场或自身内部经营问题，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当这种状况长时间得不到改善的时候，法人就会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所有程序结束法人宣告破产后，法人资格即终止。第三是根据法律规定或行政命令而终止。

终止程序根据法人的类型而不同。营利法人在权力机关通过解散决议后，委托专人进行清算，并完成清算和注销。非营利法人通常涉及公共利益，所以其终止程序相对来说就繁琐和严格一些，先由主管机关作出决定，然后清产核资，最后注销。特别法人的终止程序就更加严格了。以机关法人为例，第一，机关法人不能自行决定解散与否。这是因为其通常是作为国家机关出现，国家权力是其存在的基础，因此它的产生和终止是严肃和权威的。第二，机关法人不因破产而解散。因为其运作资金由国家财政拨款，债务承担也有国家财政预算做基础，不会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因此其因破产而终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最后，根据《民法典》第98条可知，机关法人终止的最主要原因是被依法撤销。

鉴于二者都是特别法人，故机关法人的终止规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具有较

大的可参照性和借鉴意义。在广东省相关条例中，成员大会表决是必经的前置程序，之后还要经基层政府审核通过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可以解散，并且需要报上一级政府的相关主管部门备案，依照债权债务的相关规定对组织的财产关系加以清算；集体资产应由集体经济组织终止前的成员大会做出后续的处理决定。笔者认为此规定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其既反映了集体成员的意愿，也反映了国家的意志，兼顾了特别法人的特殊性质。同时也要注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终止程序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只有成员大会或法定权力机关才可以做出撤销决定，并需报基层政府审核批准。

关于破产制度的适用尚有争议，但是主流观点不支持适用破产制度。笔者认为当前情况下主流观点是有道理的。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必然是区别于营利法人的，其适用《破产法》显然是不合适的。其次，前文多次提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成立要以一定区域的集体土地为基础，若其直接适用破产制度，那其所有的土地也将作为法人资产偿付负债，这显然是不被允许的。最后，基于破产制度的制度价值考虑：防止债务进一步膨胀，维护经济秩序；避免投资人责任过重，以防打击投资人进入市场的信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适用破产制度尚有困难。因为法人破产最重要的是财产清算，但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财产认定存在困难，比如涉及公益性质的基础公共设施等资产，以及集体所有土地，这些是否应被纳入破产财产的范围进行清算都是尚需解决的问题。并且没有现存成熟的相类似的法人破产制度可供参照，这无疑增加了其破产制度构建的难度，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

5.5 建立法人的组织制度

5.5.1 确认成员认定标准

成员是社团法人的基本要素，也是法人内部组织体系建立的基础，成员的认定还涉及利益分配的问题，因此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完善特别法人制度非常重要。但目前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立法还是空白的，以致于实践中各地成员资格认定标准不一。成员资格认定机制的缺位必将造成成员身份的混乱。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全国各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不一，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界定标准很难达成一致的共识。

（1）成员的产生

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前的实践来看，关于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主要有三种

方式：其一是单纯以户籍为标准。即简单根据人们的常住户口来判定其是否拥有成员资格。其二是户籍加实际生产生活情况的复合认定标准。即不仅要求户籍归属于组织所在地，同时还要满足有长期在本地生产生活的事实条件。其三是要求本人实际上与组织存在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认定标准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这三种认定标准是实践中常用到的，但是都有缺陷。不可否认第一种标准在集体所有制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户籍制度的本质是方便行政管理，并且单一的户籍认定标准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其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下复杂的社会情况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与城镇间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这一过程会伴随着更为复杂的成员资格认定问题，如因婚姻、升学、服兵役等原因已将户籍迁出的人的资格认定。第二种标准相对于单纯户籍认定而言，能够比较灵活的处理实践中的复杂情况，但“长期在本地生产生活”的标准又是一个缺乏认定标准的问题，此外，当下城乡人口流动的现实也是使用这种标准的阻碍，有些农民在农闲时选择外出务工，对于这类虽然不是长期居住在户籍地但事实上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人来说，这种认定标准可能会打击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第三种标准涉及权利义务的判断，实践中受主观性影响较大，因此应用起来是比较复杂的。

笔者认为，鉴于农村发展的现状和集体经济组织的特殊性，确定成员资格标准应从实际出发。从其发展历史来看，区域性这一特点始终是伴随其发展的最鲜明的特质，因此根据人员的户籍信息确定成员资格无疑是很合理的。从成员权本身来看，成员权的主要内容是其所享有的财产性利益，包括依靠成员身份享有的利益和作为成员参与组织事务管理的权益。对于世代生活于此，在集体化时期把自家私有财产投入集体，且又参与到集体劳动中的人，当然应该享有成员权。总的来说，笔者认为，采用户籍登记作为基本认定准绳，并结合其他因素综合认定的方式最为合理。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依户籍取得和依申请取得。户籍取得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原本在生产大队的人及他们的后代。无论父母双方还是一方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新生儿都应获得成员身份。二是因政府搬迁政策迁入到新区域的。有人认为这种应通过向迁入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取得成员身份。但笔者以为可以自动取得，因为户籍标准是自动取得，而政策性搬迁后户籍会自动变更，那此种情况下户口就是其资格的最好证明，无需再申请。三是由于婚嫁或合法的收养造成的人口变动，也可以自动获得成员资格。至于依申请取得就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主要就是考虑申请加入的成员与

被申请人的组织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无论是通过对组织出资产生的权利义务还是通过土地承包经营产生的利益关系，都可以不依户籍而申请加入，但是需要走必经的程序。广东省对此类加入规定了成员大会多数决的投票程序。有些地方对取得成员资格的年龄也有要求，如湖北省要求本集体组织的人年满十六周岁才可获得成员资格。笔者以为，限制成员年龄是不当的，因为虽然他们或许因为年龄尚小未能为组织创造利益，但他们的长辈却为组织积累着财富，可以限制他们成为成员代表或参加成员大会的权利，但不能剥夺他们享受组织带来的利益的权利，缺乏独立生存能力的组织成员更应该受到集体组织的庇佑。

（2）成员资格的丧失

入社和退社自由是现代私法团体运行的原则之一。但是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来说，退出集体组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关于成员资格的丧失还没有统一的规定，仍然仅在一些省市的相关条例中有所涉及。

因婚嫁原因导致成员资格变动是较为常见的，但是婚嫁带来人员流动，户口却不一定随之更改，此种情况依户籍标准取消成员资格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根据当地的习惯和政策以及夫妻双方实际生活情况决定更为适宜。通常结婚后是女方脱离原来生活的地区到男方生活的地区定居，因此女方婚后便成为这个区域的长期居住者，理应丧失其原生活区域的成员资格而成为男方所在区域的成员。还有一种情况是双方婚后都在城市定居，但未从农村迁出，此种可以适用民法典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来保留其成员资格。针对因务工或经商离开户籍地的人员，笔者认为其不是永久性的脱离集体组织，且户口都在原籍地保留，不应认定其丧失成员资格，只有发生死亡或迁出户籍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时候，才当然的丧失成员资格。去外地学习的人和在法律上有义务服兵役的人，这两类人离开户籍地不是因经济动机，他们的户籍变动具有政治原因和短期性，例如一学生将其户籍迁到大学，但其毕业后户籍将无法继续保留在大学，此种情况不能直接认定该学生丧失了成员资格。^①以上都是因客观原因引起的成员资格丧失的讨论，那么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主观上想脱离组织，能否依个人意愿自由退出呢？

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当所有者在集体资产中的利益可以自由转让和有偿退出时，

^① 陶钟太朗，沈冬军．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J]．中国土地科学，2018，32(05)：7—13．

才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利用,才能将其潜在的市场价值表现出来。^①但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尚未完善,当前情况下允许成员对外转让“股份”,难以保障农村社会的稳定性,但是可以适当允许“股份”的对内转让,然后等到我国特别法人制度完善之后再通过减少交易限制,彻底实现集体资产的自由流转和成员的有偿退出。此外,成员有偿退出的程序也是需要考虑的事项。我国有合伙人退出合伙企业的程序规定、股东退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序规定,那么成员退出集体经济组织是要借鉴这些程序还是需要另辟蹊径?笔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有限公司类似,都具有较强的人合性,故考虑到这一问题,有限责任公司半数决的模式更适合借鉴。

5.5.2 完善成员权体系

(1) 成员的权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可以满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双重需要。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有具备法律人格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才能作为主体行使集体所有权,提高集体资产的合理化利用和加快集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是实现成员权利的保障,在物质方面,随着集体经济的增长,成员可以分享由此产生的所有权利益,在思想方面,法人合理的内部治理机制有利于表达成员真实想法,使成员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因此,完善成员权制度是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重要内容。总的来说,要以成员资格认定为前提,以成员权利架构为内容,以权利救济机制为保障。

关于成员资格认定的重要性及认定标准的思考,笔者在前一部分已经详述,此处只涉及成员权利结构和对成员权利保护的讨论。成员权利是集体经济组织内调节公私利益冲突的杠杆。^②所以平衡个体与集体间的利益是构建成员权体系的原则,要注意的是平衡并不是要求平均,而是要实现二者在动态发展中的最佳分配状态。根据利益归属不同,成员权利有共益权与自益权之分,这种分类容易因“公私利益”难以分离,而造成区分标准不明确,笔者认为可以从实践角度考虑,更合适的方法是,根据实体和程序之间的区别来建立成员权利制度。此种分类不过多纠结于理论上的解释,而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实践中做到尽可能充分地将成员的全部权利都纳入其中,从而保证

^① 吴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制建构[J]. 河南社会科学, 2021, 29(02): 28-36.

^② 刘俊海. 基于公司理性自治的公司法规范重塑[J]. 法学评论, 2021, 39(05): 1-12.

对集体组织和其成员的权益保障有法可依，有迹可循。参与集体事务、享受集体利益是成员享有的两项最重要的权利，故程序性权利是为了让成员参与法人管理、确保法人健康运行而产生的，实体性权利则是由于财产利益而产生的。

实体性权利主要是对集体资产享有的权利，即对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享有的权利。经营性资产的权利内容通常表现为享有收益分配上；非经营性资产的权利内容通常反映在获得公共服务和集体保障的权利上。成员对上述资产产生的收益还享有使用权和处分权等，既可以由成员自行请求也可以由组织进行分配。除此之外，在确定权利时应考虑成员利益的排他性，把保护成员利益放在首位，以防止非成员在“三权分置”改革中使用承包地和宅基地影响成员或集体利益。程序性权利的行使和保障很大程度上影响法人内部治理的实施。知情权是成员了解与其自身利益有关的重要问题的权利，是消除信息不对等而有效行使表决权和监督权的前提；表决权是保障成员可以有效参与法人治理、使法人意志体现成员意愿的保障；监督权意味着成员的权利和利益通过提案和问题得到维护，这是个人理性的再表达。^①程序性权利的行使能够激励成员主动参与集体事务，从而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表达农民集体真实意志。

（2）成员权的保障

“无救济则无权利。”任何权利只有在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权利，并且司法保护是兜底性的救济手段。但目前关于成员权利救济的立法分散于多个法律法规中未成体系。当前相关的规定或诉讼先例主要有：在权利主体争议方面，如果根据资格标准或村民自己规定的条件确认成员资格后仍有争议，则可由法院认定，这种表达认为成员资格认定具有可诉性。《民法典》第 265 条的撤销权，虽然是对成员权的保护，但这一规定过于笼统和简单，缺乏可操作性，需要在立法中加以细化。《民法典》在一些方面促进了成员权利的实现和救济。首先，《民法典》第 1164 条所称民事权益包含成员权在内的所有民事权益，因此，成员权也应受侵权责任编的保护^②。其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的确立为成员代表诉讼制度的适用创造了条件。特别法人的成员代表诉讼可以将公司法人的股东代表诉讼作为参考，并要考虑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殊性，注意平衡法人自治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比如合理设置符合农民维权能力的原告资格标准，防止要求过高造成制度虚置和要求过低造成滥诉。

^① 谭艳.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构建[D]. 西南政法大学, 2019.

^② 王利明, 周友军. 论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的完善[J]. 中国法学, 2012(01): 45-54.

5.6 构建职能分明的内部治理结构

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内部治理结构的构建，笔者倾向于借鉴公司制的治理模式，并且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模式更合适。因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只在其资本投入的限度内承担有限责任，从而大大降低了股东的风险；此外，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用以出资的财物更符合中国农民目前的经济状况。但是农村集体经济法人也不是完全适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比如股东人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原始成员数量较多，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最多 50 人。因此集体资产的折股量化和分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首要任务，但为了方便登记，可以推选 1 至 50 人作为登记代表，未登记名字的成员也是股东，无差别的享有股东权利。内部治理结构是法人制度的灵魂，借鉴公司制度就要遵循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位一体的制衡架构，这样才能提高法人运行效率，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适应市场的速度。

5.6.1 权力机构

权力机构主要负责重大事项的决策，如前文所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决策机制并不完善，也不民主。最高决策权往往掌握在该组织或乡村委员会的管理人员手中，普通成员无权发言。甚至有组织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亲友安排职务，随意处置集体资产，造成集体组织资产流失，因此构建一个全新的权力机构刻不容缓。

权力机构初始构成可以由集体组织的最初成员组成，所有成员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机构内部以公开公正为决策原则，凡涉及资产变动与使用、利益分配及使用、重大人员调整等关系股东切身利益的事项，必须由成员大会审议、接受内部的监督，及时公开结果。但法人化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想要在市场中长期发展，必然要引入外资，仅靠集体组织成员入股难以为继，更何况现阶段集体组织的成员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对法人在市场中的运作和经营更是缺乏相应地了解和管理能力，完整合理的决策机关不仅有利于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自身的管理，更可以吸引强有力的外资注入，从而提高法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

故笔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稳定后，不应继续由成员大会行使全部决策权，而应由股东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事务决策权要全权转移给股东会，在涉及成员服务和成员权保障等非营利性事项时，可以由董事会对拟决议的内容起草文件，由村民会议审核，审核通过后进入股东会进行表决。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是特别法人的特点体现之处，只是可能产生前置程序和后置程序之争，此种矛盾可在起草章

程阶段与各方沟通、磋商，这也是民主性的体现，若仍无法敲定，由乡政府介入协调也是可行的，但要把握政府介入的程度，绝不可有决定之权。

5.6.2 执行机构

不同地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中对组织执行机构的设置各不相同。浙江省的是社管会；湖北省的是管委会；广东省的是社委会或者理事会。由此可知实践中执行机构主要有两种设置方式，一是另行组成管委会，二是不另设管委会，直接由村委会作为执行机构，村委会主任担任法定代表人处理内外事务。但是笔者在前文提到村委会代行职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过程中的一大问题，尤其是想要实现“政经分离”就更要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分离开来。故笔者认为采取另设管委会作为执行机构的方式是最合适的。管委会成员同样应由成员大会选举，其内部也要选拔正副委员长等骨干人员，负责内外事务，尤其是经济活动。

管委会成员对内负责经营管理组织事务，因此在选举时应考察被选举人的以下条件：首先被选举人须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因为只有了解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因此组织内部成员是最佳人选；其次，被选举人应具备管理集体经济组织事务的能力和素养，这是任何专业组织机构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最后，被选举人须是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行政村内长期居住的人，因为管委会是常设机构，主要负责日常事务的经营管理，因此要求其组成人员常住是该机构有效发挥职能的保障。

5.6.3 监督机构

相比于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实践中各地在监督机构的设置方式上较为灵活。浙江省的是社监会；湖北省的没有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广东省的是民主理财监督小组或者监事会。无论哪种类型的监督机构，都属于内部监督机关。监督机构既要监督权力机构的决议与工作，也要对执行机关高管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如果发生侵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成员利益的行为，必须及时纠正，必要时，可以提起代表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其职能等同于公司法人的监事会，因此监督机构还可以检查组织的财务状况、对组织内部审计进行监督。

实践中的监督机构有监督小组、有社监会，但不管名称如何，其实质是法人内部监督机构。从监事会的职能来看，监事会成员的选举应考虑以下几点：第一，为保障监督的有效性，监事会的成员要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构成；第二，为保障监督的专业性，监督人员中须有具备财会、管理等知识的专业人才，但董事和高管不得兼任监事；

第三,为保障监督的全面性,监事会有权旁听决策会议,了解一切信息。监事会对成员大会负责,向其汇报工作。此外,集体成员认为某项决定侵害了集体或股东利益的,也可报告给监督机构。严格的监督机制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在透明化的监督下运作,避免了村委会或少数村干部集中权力操控资产,从源头上抑制腐败。

5.7 厘定法人财产制度

厘定法人财产关系、厘清法人财产来源、明确法人主体地位、找到增资方式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建设要面对的问题。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主要财产来源,这是没有争议的,其所包含的内容笔者在前文已经论述过,此处不再赘述。由于社会公益职能的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还会受到政府帮扶,此时政府扶助资金也是转化后的法人资金来源之一。前文还提到外资的投入,那么外部资金能否纳入法人财产来源呢,笔者认为外部资本只是在法人设立以后加入,仅参与法人在市场中的经营活动并从中获取收益,故而外部投入的资金可以作为法人财产来源但不属于法人的设立财产。

关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争论在此处亦需要予以关注。在理论界和实践中,有学者认为集体资产的字面意思已经表明集体组织是集体财产的所有者;^①也有学者认为改制后的集体土地实际上由集体经济组织所有;^②在实践中甚至有因对二者的理解错误,造成政策文件也有使用错误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应当在法治范围内认定。

首先,梳理相关立法,《土地管理法》第11条、《民法典》第261条第1款,此两条规定根据文义解释,“农民集体”是拥有集体资产的主体,而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集体”的代表主体。其次,就集体所有权本身的价值来看,集体所有权主体并不是直接经营集体财产,而是享有土地所产生的价值利益。设定用益物权是实现集体所有权的方式,因而更加值得关注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利用”,若成员的行为得到有效规范、利益归属得到合理安排,那么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是否必须明确到可以直接在经济市场中进行交易呢,答案是否定的。再次,《民法典》第60条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第5条对比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责任财产中,土地要素可能仅包含“三权分置”改革后的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这也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是集体所有权主体,只是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因而由此转化而来的特别

^① 林广会.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集体所有权主体制度的机遇与展望[J]. 求是学刊, 2020, 47(03): 95-106.

^② 杨一介.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J]. 中国农村观察, 2015(05): 11-18+30.

法人也不是所有权主体。这不仅促进了土地所有权价值和特殊保护功能的实现，而且有力地维护了集体所有制的基础和发展，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共同体”代表主体的立法构想，适应市场化需要，并能够有效规避风险。

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入市场的资格是确立其特别法人地位最重要的意义。任何市场主体都需要依靠市场本身来实现经济目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也不例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点是培育新型农业主体、发展股份合作、引进社会资本、接受优惠政策和寻求外部支持，以改革集体管理资产的股份合作制度为重点，创新交易方法、满足市场需求，例如通过转让股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价值，最大限度地提高交易效率，最大限度地分配市场。^①除此之外，国家发改委公布了 2020 年建设新型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主要任务，旨在通过放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租赁，增加闲置低效土地的流动性；通过使用权流转、交换、抵押，拓宽集体经济组织可支配收入增长途径，获取市场红利、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① 房绍坤.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法治保障进路[J]. 求索, 2020(05): 14-23.

结语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上取得特别法人地位，但关于特别法人制度的具体构建却没有详尽的说明。虽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正在起草，也已出台试行章程，但是仍存在较大问题，难以适应特别法人的发展。本文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概念、历史、实际状况、专门性立法以及与相近主体的区别加以考察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构想。即基于当前我国农村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认可的合作制与股份合作制法人形式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但仍需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属性加以调整，企业法人形式从长远发展来看更具优势，可以考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兼顾自身特点的前提下，借鉴成熟的公司法人模式，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制度、制定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完善成员权体系、构建内部治理结构、厘定法人财产制度，经过一系列的制度构建朝着法人化方向转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构建始终要以“特别”为中心，决不能将该制度的设计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和发展的背景割裂开来。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过程也是对我国当下农村地区的各项制度进行系统梳理的过程，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是组织自身的改革，更是关系到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改革。

本文尚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课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制度构建的大框架来着手，对个别制度的具体设计上缺乏更充分的研究和论述；且笔者所言的制度框架也未必能够全面回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客观需要，所有的构想都有待实践的检验；以及之后的立法规定如何实现与已有规定相适配、股份制度改革如何更进一步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能否破产和破产适用的程序问题等都还存在空白，需要做进一步的立法探索。相信通过各界的努力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终将完善，“三农”问题也将得到更好地解决。

参考文献

一、专著

- [1]孙宏臣. 民法总则精解[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92.
- [2]孙迎春. 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治理结构法律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0: 100—102.
- [3]王利明. 民法学(第五版)[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7: 112.
- [4]魏振瀛. 民法(第七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08.
- [5]高海. 农用地“三权分置”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7.
- [6]何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重构[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
- [7]戴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制度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6.
- [8]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829.
- [9]列宁. 列宁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29—731.
- [10]王春梅. 苏联法对中国民事主体制度之影响[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7.
- [11]冯蕾.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研究[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 138—140.
- [12]王利明. 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第二版)[M]. 法律出版社, 2016: 358.
- [13]朱庆育. 民法总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23.
-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M]. 北京: 中国文献出版社, 2011: 384—385.

二、连续出版物

- [1]宋天骐.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内部治理中的“人”与“财”——以治理机构的人员构成与集体资产股权为观察对象[J]. 河北法学, 2022, 40(04): 34-50.
- [2]于雅璐, 王崇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发展历程、检视与未来展望[J]. 农村经济, 2020(03): 10-18.
- [3]李国强, 朱晓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理机制研究[J]. 财经法学, 2022(01): 62-75.
- [4]王洪平. 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和主体性关系[J]. 法学论坛, 2021, 36(05): 18-28.
- [5]管洪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制立法建构的基本思路[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0(01): 51-60.
- [6]李永军. 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历史变迁与法律结构[J]. 比较法研究, 2017(04): 35-52.
- [7]陶钟太郎, 沈冬军.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J]. 中国土地科学, 2018, 32(05): 7-13.
- [8]管洪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类型定位之证成与价值展开[J]. 法学论坛, 2021, 36(05): 29-39.
- [9]韩俊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立法路径与方案设计[J]. 农村经济, 2019(02): 131-137.
- [10]宋天骐.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设立的特别性[J]. 求索, 2020(05): 154-162.

- [11]刘俊海. 基于公司理性自治的公司法规范重塑[J]. 法学评论, 2021, 39(05): 1-12.
- [12]杨立新. 《民法总则》对民法基本规则的成功改革及成因[J]. 法治研究, 2017(03): 3-13.
- [13]李永军, 刘家安, 翟远见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物权编(专家建议稿)[J]. 比较法研究, 2017(04): 174-200.
- [14]肖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属性的再思考——以《乡村振兴促进法》为中心[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0(06): 126-133.
- [15]许中缘, 崔雪炜. “三权分置”视域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J]. 当代法学, 2018, 32(01): 83-92.
- [16]李永军, 张艺璐. 论特别法人制度的立法价值及特殊功能——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为视角[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9(01): 34-39.
- [17]高飞. 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的缺失根源及解决路径[J].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0, 23(04): 8-14.
- [18]吴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制建构[J]. 河南社会科学, 2021, 29(02): 28-36.
- [19]方志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若干问题[J]. 中国农村经济, 2014, (7): 4-14.
- [20]林广会.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集体所有权主体制度的机遇与展望[J]. 求是学刊, 2020, 47(03): 95-106.
- [21]陈小君. 我国农民集体成员权的立法抉择[J]. 清华法学, 2017, 11(02): 46-55.
- [22]陈小君, 高飞, 耿卓等. 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权利体系与运行机理研究论纲——以对我国十省农地问题立法调查为基础[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0, 28(01): 82-97.
- [23]刘小红.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的重构[J]. 农村经济, 2012(07): 122-126.
- [24]管洪彦, 傅辰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民主决策的异化与匡正[J]. 求是学刊, 2020, 47(03): 84-94.
- [25]房绍坤.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法治保障进路[J]. 求索, 2020(05): 14-23.
- [26]李进.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法律问题研究[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6, 7(04): 81-84.
- [27]谭启平, 应建均. “特别法人”问题追问——以《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稿)为研究对象[J]. 社会科学, 2017(03): 82-91.
- [28]陈美球, 廖彩荣.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共同体”还是“共有体”?[J]. 中国土地科学, 2017, 31(06): 27-33.
- [29]管洪彦. 农民集体的现实困惑与改革路径[J]. 政法论丛, 2015(05): 96-103.
- [30]秦维明, 余葵, 祁睿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的政策建议[J]. 农村工作通讯, 2014(14): 31-32.
- [31]方志权. 完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的实践与探索[J]. 科学发展, 2016(04): 55-59.

- [32]王利明,周友军.论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的完善[J].中国法学,2012(01):45-54.
- [33]朱悦衡,黄韬.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的主体化及其治理机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02):42-54.
- [34]杨一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J].中国农村观察,2015(05):11-18+30.
- [35]于飞.“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谁为集体所有权人?——风险界定视角下两者关系的再辨析[J].财经法学,2016(01):44-50.
- [36]许中缘,崔雪炜.“三权分置”视域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J].当代法学,2018,32(01):83-92.

三、学位论文

- [1]高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4.
- [2]谭艳.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构建[D].西南政法大学,2019.
- [3]易高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构造研究[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9.
- [4]刘孝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章程制度研究[D].山东政法学院,2020.
- [5]应建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主体确定及其实现[D].西南政法大学,2018.
- [6]张喜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组织形式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9.
- [7]马凌云.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问题研究[D].天津商业大学,2018.
- [8]武佳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构建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9.

致谢

致 谢

